

# 中國現代小說史

第三卷

楊義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 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三卷

杨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罗君策  
封面设计：古干  
封面题字：沈鹏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

Zhongguo Xiandai Xiaoshuoshi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3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4\frac{1}{16}$  插页 2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650

---

ISBN 7-02-001157-8/I·1082 定价 9.00 元

#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小说的普及和深化	1
第一节 第三个十年新文学的进程	1
第二节 文学观念的分流、深化与复归	15
第三节 创作成就和小说体式的变迁	32
第二章 出入战区的流亡作家	55
第一节 在“文章下乡入伍”的浪潮中	55
第二节 碧野：浪迹天涯的艺术探寻	61
一 北方原野的忧郁	61
二 南国山海的强悍	69
第三节 姚雪垠：寻觅中原山地的豪强性格	78
一 追求抗战文艺的厚实和多样	78
二 在广泛探索中显示艺术潜力	86
第四节 王西彦：穿越乡土与人性的废墟	93
一 悲凉乡土上的坚韧人性	93
二 寻梦者的困惑和失落	103
第五节 田涛：京派的流亡	112
第六节 其他大后方作家	122
一 陈瘦竹	122
二 刘盛亚	128
三 汪曾祺	135
第三章 七月派小说	141

第一节	七月派的演变及其创作特征	141
第二节	丘东平：直追人物的心理性格	155
一	悲壮忧郁的艺术探索	155
二	战争中民族意志的发掘	162
第三节	路翎：在心灵史诗的探索途中	169
一	动荡时世的原始强力	169
二	燃烧土地上的绝望和希望	177
三	沉痛愤激的心灵狂潮	184
第四节	“七月派”其他作家	191
一	彭柏山	191
二	冀访	196
第四章	华南作家群	200
第一节	华南文化勃兴和本土作家特色	200
第二节	马宁：传奇人生与政论味小说	210
第三节	司马文森：传奇生涯与开阔艺术	219
一	战火中的审美选择	219
二	南洋闽中特殊的光与色	227
第四节	黄谷柳：富有民间色彩的华南作家	236
一	粤港社会的浮世绘	236
二	在民族形式的探索途中	241
第五节	于逢、易巩：战火中发掘岭南的壮与悲	247
第六节	陈残云：把南国诗情画意融入小说	256
第七节	侣伦：港味城市文学的开拓者	265
第五章	东北流亡者作家群(下)	275
第一节	端木蕻良：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	275
一	现代小说界的边塞诗风	275
二	大江南北的风俗文化反省	284
第二节	骆宾基：北望边陲的人生体悟者	296

一	从边陲烽火中获取忧愤和灵感·····	296
二	乡邦思念和人生反省的交错·····	305
<b>第三节</b>	其他流亡者作家·····	316
一	罗烽·····	316
二	白朗·····	321
三	孙陵·····	328
<b>第四节</b>	东北沦陷区小说·····	333
一	文学发展概况·····	333
二	文选文丛派与梁山丁、王秋莹，以及关沫南·····	340
三	文艺志派作家·····	354
<b>第五节</b>	华北沦陷区小说·····	367
一	文学发展概况·····	367
二	多元探索与袁犀、梅娘、关永吉·····	375
<b>第六章</b>	上海孤岛及其后的小说·····	389
<b>第一节</b>	从“孤岛”不“孤”到“文艺复兴”·····	389
<b>第二节</b>	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	413
一	从“看似京派”到“不是京派”·····	413
二	在悲愤牢愁中拓展小说体式·····	424
<b>第三节</b>	徐訏：透迤于哲理、心理和浪漫情调之间·····	436
一	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	436
二	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	444
<b>第四节</b>	张爱玲：洋场社会的仕女画家·····	452
一	为上海人写香港传奇·····	452
二	化古老为新鲜的笔情墨韵·····	464
<b>第五节</b>	钱钟书：才学兼胜的讽刺奇才·····	473
一	写在人生边上·····	473
二	新《儒林外史》·····	480
<b>第六节</b>	其他作家·····	488

一	罗洪	488
二	程造之	498
三	无名氏	500
<b>第七章</b>	<b>解放区小说(上)</b>	<b>513</b>
<b>第一节</b>	理论方向和创作新貌	513
<b>第二节</b>	赵树理：地道本色的新“农民作家”	531
一	来自底层的“文摊文学家”	531
二	紧贴现实的“问题小说”	537
三	描写新的天地和人群	546
四	农民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	554
<b>第三节</b>	马烽：从新英雄传奇到乡土写实	562
一	一部争相传阅的章回体小说	562
二	山西乡土轻松别致的绘写	565
<b>第四节</b>	柳青(前期)：黄土地上艺术潜力的呈露	574
<b>第五节</b>	孙犁：风云变幻之秋的诗体小说	583
一	水乡和山地的画卷	583
二	战争和社会变革中的诗魂	593
<b>第八章</b>	<b>解放区小说(下)</b>	<b>604</b>
<b>第一节</b>	周立波：农村社会变动的风俗画家	604
一	暴风骤雨中的文学新路	604
二	由家庭和心灵透视山乡巨变	610
三	动态风俗和乡土幽默	617
<b>第二节</b>	康濯和马加：北方土地的初春画卷	626
一	质朴清新的农家情调	626
二	江山的喜悦和草原的悲壮	636
<b>第三节</b>	孔厥(和袁静)：新英雄传奇及其变奏	643
<b>第四节</b>	刘白羽：政治抒情的战争文学	652
一	以忧郁的眼光窥视北方大地	652

二	“随军记者——小说家”的艺术风度·····	658
<b>第九章</b>	<b>台湾乡土小说(下)</b> ·····	665
<b>第一节</b>	战争期和光复初期台湾文学·····	665
<b>第二节</b>	吴浊流：亚细亚孤儿的铁血之魂·····	668
一	吴浊流为历史作证的文学精神·····	668
二	与吴浊流并起的作家·····	677
<b>第三节</b>	钟理和：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	685
一	悲凉的乡土歌谣·····	685
二	染血的身世小说·····	690
<b>第十章</b>	<b>旧派通俗小说</b> ·····	696
<b>第一节</b>	旧派小说之蜕变·····	696
<b>第二节</b>	张恨水：蜕变期章回小说大家·····	713
一	章回体的集成与改良·····	713
二	忧世伤时的现实精神·····	725
三	在雅俗新旧之间的艺术个性·····	735
<b>第三节</b>	旧派小说其他名家·····	743
一	社会与言情：李涵秋、秦瘦鸥、刘云若·····	743
二	侦探与武侠：程小青、不肖生·····	755



## 第一章 现代小说的普及和深化

### 第一节 第三个十年新文学的进程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民族生存史上的、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新的一幕。文学在全民族性的战争的持久延续和潮汐般的涨落中，开始了自己呐喊与沉思、普及与深化的生命历程。事变次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主张“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对日宣战的庐山谈话，至9月23日又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和“接纳”共产党合作的谈话。于是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御侮的战时政治格局。但是由于政府军队的积弱惧敌和脱离民众，造成了战场上的大溃退，致使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都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陷落。这就带来了文化中心散落、转移和重新汇聚的特殊现象，以及大群的作家在颠沛流离中奔走呼号转而痛苦沉思，时而激昂奋发、时而忧郁深邃的特殊的心灵历程。

文化中心的聚散转移，外之联系着整个战争的局势，内之联系着作家的心理情绪状态。因而，它深刻地规定着和影响着战争时期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抗战时期的文学风气的转换，在这里也可以获得某种说明。胡风和茅盾对此早已有所觉察，指出

“象抗战以前的上海那样的文艺中心，今天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文坛已形成了好几个重心点，重庆是一个，而桂林、延安、昆明、金华（按：不如换作香港），乃至上海，也都是其中之一”。文化中心的散落，促使作家“脱出了狭隘的文化圈子底束缚”，而“专以全国范围的文化水准高的读者为对象的情性不能继续”，为战争激发了的作家实践热情“诱起了他们各个想向特定的大众里面突进，汲取大众底生活欲求的热望”，于是“文艺上的大众化问题也得重新提起”。<sup>①</sup>理论家的这些言论，直观地把文化中心的散落，与作家的社会环境、接受对象、创作情绪和艺术趣味联系起来。

战争摇撼着固有的文化中心，它同时摇撼出来的是大批作家炽热欲燃的民族热情。他们把民族存亡放在比创作得失更为重要的地位，放下原有的创作计划，投身于抗日宣传和战地服务。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等八十三人为理事，并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以宋之的、洪深、应云卫、陈鲤庭、于伶等人为各队队长。次月，该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该刊发表的《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称：“民族战争的号角，已经震响得使我们全身的热血，波涛似的汹涌起来了！……我们是诗人也就是战士，我们的笔杆也就是枪杆。”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丛》、《译文》以及《中流》停刊后，于同月联合出版《呐喊》周刊（出二期后改名《烽火》），并在《本刊启示》中称：“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由胡风主编的《七月》周刊（移武汉后改为

<sup>①</sup> 茅盾：《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载1941年4月《中苏文化》第8卷第3、4期合刊；胡风：《民族战争与艺术性格·大众化问题在今天》。

半月刊，移重庆后改为月刊），也于同月创刊于上海。它于第1集第1期的“代致辞”中主张：“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相。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因而该刊成为当时最富有文学个性的刊物。

然而，当时的作品为了便于宣传抗日道理，几乎均为短制：朗诵诗、战地报告、通俗故事等等。也有长篇，则是集体创作，共同的民族热情压倒了艺术品的个性，在刚健、明了中发挥着宣传作用。中国剧作者协会的三幕剧《保卫芦沟桥》，由崔嵬、张季纯、马彦祥、阿英、于伶、宋之的等十七人写作，夏衍、张庚、郑伯奇等四人整理，冼星海、周巍峙等六人作曲，在芦沟桥事变的当月脱稿。此后又有集体创作的三幕剧《突击》、《台儿庄》、《八百壮士》相继问世。小说领域的集体创作，更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未见。移到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则于1938年2月起，连载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华北的烽火》。陆续刊出的有：沙汀的《前夜》、艾芜的《演习》、周文的《怒火》、舒群的《爆发》、蒋牧良的《突破》、聂绀弩的《找和平》、张天翼的《左右为难》、陈白尘的《全线总进攻》和罗烽的《反正》。它叙写芦沟桥事变到平津失陷期间的抗日故事，原计划有二十余位作家参加创作，未能卒篇。略早于此，则有欧阳山、丘东平、草明、邵子南、于逢集体创作，由丘东平执笔写成的中篇小说《给予者》。它描写从“一·二八”事变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几年间，一个由工人、而士兵、而连长的人物的经历，塑造了一位“用了自己的全生命保护祖国，而什么东西也没有收受”的“给予者”形象。这种集体创作的风气，是作家们共同的民族热情的猛然宣泄，虽然采取的不是正常的艺

术创作的方式，却洋溢着全民性的时代情绪，因而不能简单地、或冷漠地溢之为“抗战八股”和“公式主义”的。

上海失陷以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文化中心移至武汉和广州。这期间发生了中国文坛上举世瞩目的盛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成立。还在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在汉口成立的时候，阳翰笙就和王平陵详谈，希望中国文艺社发动一件在中国文艺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工作，这就是组织文协的最初动议。其后，武汉文艺界频繁聚会磋商，推选老舍、冯乃超、曾虚白、王平陵等二十余人为这场盛事的筹备员。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假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五百余人。大会通过了文协的《宣言》和《简章》，推举了老舍、郭沫若、茅盾、邵力子、冯玉祥、张道藩、丁玲、许地山、巴金、夏衍、郁达夫、郑振铎、田汉、朱自清、陈西滢、朱光潜、沈从文、张恨水、谢六逸等四十五人为理事。4月4日，冯玉祥召集第一次理事会，推定十五人为常务理事，并推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楼适夷为组织部正副主任，姚蓬子、老向为出版部正副主任，郁达夫、胡风为研究部正副主任。在一年的时间里，又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宜昌襄樊，以及延安等地的文协分会次第成立。文协的成立，体现了中国文学艺术家在抗日旗帜下不分集团、流派和艺术上雅俗新旧的一次空前的团结，它是民族存亡的关头一种带全民性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精神在文艺界史诗性的结晶。文协于1938年5月创办《抗战文艺》，《发刊词》说：

这一个文艺的堡垒，由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已经奠下了最初的基石。《抗战文艺》的发刊是首先在这基石上树起一杆进军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之下，我们号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为着

强固文艺国防，首先强固起自己阵营的团结，扫清内部一切纠纷和磨擦，小集团观念和门户之见，而把大家的视线一致集注于当前的民族大敌。其次把文艺运动和各部门的文化的艺术的活动作密切的机动的配合，谋均衡的普遍的健全的发展。并且我们要把整个的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运动，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

《抗战文艺》共出七十八期，另有特刊二册，到第10卷第6期终刊，已是1946年5月4日了。这是唯一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影响非常广泛的刊物，对于团结和扶植作家，宣传和动员民众，批评错误的文艺观点，以及在战乱时代维护作家权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协在声讨文化汉奸，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呼吁保障作家战时生活，募捐援助贫病作家，并借纪念鲁迅、为郭沫若祝寿、庆祝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以及悼念罗曼·罗兰等机会，弘扬进步文学传统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它与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道，成为大后方进步文化活动的中流砥柱。

这是一个诗情激荡，或者说以情感为诗、甚至以口号为诗的时代。诚若诗人臧克家所说：“在抗战初期，全体作家可以说都是诗人。由于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的狂风暴雨，中国作家们的情绪燃烧到了最高度，而诗歌是一种最直接表现激动情绪的形式，那时候大家都写诗，所有的杂志报纸副刊都大量的刊载诗篇。”<sup>①</sup>这种情绪燃烧，使文协成立和《抗战文艺》发刊前后，成了抗战报刊竞相创办的第一个高潮期。举其要者，有田汉、马彦祥于1937年11月创办的《抗战戏剧》，把“动员全民族，为中华民族

<sup>①</sup> 转引自梅林：《关于“抗战八年文艺检讨”——记一个文艺座谈会》，载1946年6月《文艺复兴》第1卷第5期。

的生存，起来抗战”，作为戏剧运动唯一的特殊的任务。有老向（王向辰）于1938年元旦创刊的《抗到底》半月刊，愿其“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个字，都有炸弹般的力量，炸碎敌人的阵营”。1938年3月，有赵清阁主编《弹花》半月刊，称“在民族战争的大时代”，“文艺就是精神动员的有力因子之一”；以丁玲为团长、舒群为副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创办的《战地》半月刊，以战地通讯和速写为主，办成“一个以战地为中心的刊物”。4月，臧云远、孙陵编辑的《自由中国》月刊问世，先后发表了冯玉祥、郭沫若和毛泽东的题辞，体现了团结抗日的精神；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出版，主张“要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其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戏剧新闻》，综合诗歌丛刊《五月》，上海孤岛的《文艺》旬刊和《文艺新潮》月刊，文协延安分会的《文艺突击》半月刊，也陆续问世了。以上除特别标明出版地址者之外，大多数刊物都创刊于武汉。大批作家和报刊编辑都以高度的热情，赋予全民族团结抗日这面时代旗帜以神圣感，不容许丢弃这面旗帜，或在它上面涂上污点和灰颜色。因此，梁实秋于1938年12月《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编者的话》中，指责“抗战八股”，并弯弯曲曲地谈论“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就必然招致群情激愤的批驳了。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上述刊物中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是刻意继承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三十年代的《文学》杂志的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它历时六年、共出63期，是抗战时期仅次于《抗战文艺》的长寿杂志，而且创作、理论上的成果均极为丰硕。它最初三期推出的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和丘东平发表在同时出版的《七月》杂志上的《一个连长底

《战斗遭遇》，可以并列为抗战初期最有名气的三个短篇小说。而且以张天翼的犀利、姚雪垠的沉实和丘东平的刚猛，给当时侧重于热情倾泄和通俗叙写的小说界，增添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启发日后小说发展之思路的新的成分和色彩。

战争使作家受难，却又在一定的意义上使文学得到升华。承受着战争的强大冲击力，广大作家在大规模的长途流徙中，把原来的文化中心的新文化空气，以疾风巨浪的势头传播到辽阔的国土的西南、西北和南部，传播到以前视为边远的城镇和乡村。如果不怕时代和外敌性质方面的错误，这一点也许会使人联想到东晋和南宋时期大批文士的南下，从而开发了江左文化的。由于时代的不同，现代作家在战时流徙中开阔了社会视野，更加靠拢民众，并以忧患的情绪思考着民族的命运和出路。这就是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陷，造成文化中心散落到重庆、桂林、昆明、香港和延安诸地所带来的文化上和作家创作意识上的收获。明显不同的是新的文化中心延安，这里的作家深入民众和乡村，以明朗的心境去体验和发掘土地的儿子们美好的心灵和品格，参与开拓中国历史的新的路程。因此，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在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如果要把抗战爆发到1949年，即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区分出发展阶段来，那么1941年前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分水岭。这是武汉失守以后战争进入相持胶着状态，而敌后游击战争得到深入展开的时期，突然出现的一个多事之秋。本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摩擦和斗争加剧。针对头年冬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改组后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国民党当局于本年2月成立了以张道藩、潘公展领头的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并且组织“中国著作人协会”与文协抗衡。当局文化统制的升压，迫使一批著名作家如艾青、欧阳山、草明北上延安；茅盾、胡绳、胡风、宋之的、章泯从重庆，夏衍从桂林，去了香港。战区作家也被军队挤出来了，鄂豫皖地区的臧克家、碧野、姚雪垠、田涛流徙到重庆、成都，华南的司马文森、于逢流徙到桂林。本年底，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孤岛”上海和香港失陷。“孤岛”作家阿英、巴人、徐訏外流，其余作家转入潜伏状态。夏衍、茅盾、胡风、宋之的、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一批作家从香港脱险后，返回桂林。从而使桂林在1942至1944年湘桂大撤退这段时间，成为南中国极为繁荣的文化城。这段期间的文化中心的转移，也许还没有达到广州、武汉时期那种惊涛骇浪的气势，但是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而言，它是内在的，带有历史潜流性质的。它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战时文学的观念，以及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成果。

桂林既聚集了大批作家，又可利用广西地方实力派和重庆中央当局的矛盾，文化气氛较为宽松。因此1942年的桂林，出版公司繁多，报刊竞相涌现，其情景几乎可以同1938年的武汉相比拟。除了1940、1941年创刊的夏衍、秦似等人编辑的《野草》杂文月刊，胡危舟等人编辑的《诗创作》月刊，邵荃麟主编的《文化杂志》，和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还在继续出版之外，1942年1月，王鲁彦创办了颇有影响的《文艺杂志》，陆续发表了端木蕻良、易巩、艾芜、沙汀、王西彦、骆宾基等人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佳作，在“不违反抗战的国策”的同时，强调了“艺术价值”，显示了与抗战初期刊物有所不同的、以展示创作成就见长的刊物风格。随之，又有张煌主编的《创作月刊》，熊佛西主编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艺》，葛琴编辑的《青年文艺》，封凤子编辑的



《人世间》，孟超编辑的《艺丛》相继创刊。而胡风则在这里开始以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的方式，展示七月派相当引人注目的创作成果。

极其带有实质意义的是：1941年前后，中国各政治派别和文学流派进一步建构了和深化了各自的文学观念体系，并且在文学观念上出现相互争鸣、驳难和批判的局面。因而抗战初期那种几乎是全民性的民族热情，逐渐被新的社会理性所渗透、提升、或替代了。1940年春，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2年5月，毛泽东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著名的“讲话”，确立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基本方向，以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从而使与工农兵政治方向相结合的延安文艺，成为四十年代一种崭新形态的文艺。于此前后，蒋介石宣扬他的“民生史观”和“诚的哲学”。文化官僚张道藩于1942年9月《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他从这种官方哲学和政治需要出发，提出“六不政策”：（一）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二）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三）不带悲观的色彩；（四）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五）不写无意义的作品；（六）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又提出“五要政策”：（一）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二）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四）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五）要用现实的形式。在这种要与不要的解释和措施之下，抗战初期相对宽松的文艺气氛